

主持人语: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作为“十五五”时期首要战略任务,要求“十五五”时期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围绕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未来五年我国需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这一系列发展建议安排为经济学界指明了重要的研究方向,学界需要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学理支撑、问题分析、政策建议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本期《企业经济》设立专栏,以期为此研究提供高质量的专业研究平台,供学界进行深入交流。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

先进制造业何以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骨干?

——产业体系演化与现代化产业体系构成研究

□黄群慧 盛方富

[摘要]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什么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本文旨在为此寻求学理支撑。根据马克思用“发动机——传动机构——工作(工具)机”描述机器大工业工作原理,本文提出一个产业体系的新分类模型,即产业体系由“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构成,其中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是产业体系的核心构成。工业革命以来在产业体系的现代化演进过程中,这三类产业体系都随着通用性技术突破、新旧产业部门更替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作为对应并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其承载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可通过产业体系分类模型予以阐释,即形成以具有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特征的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主体支撑;形成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现代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绿色动力基石;形成以高速信息网、高效算力网等为主体的现代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增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基础支撑。为避免产业体系陷入“结构性陷阱”,基于产业体系分类模型,需从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以及改革完善生产关系等方面协同共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关键词] 产业体系;先进制造业;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 F4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26)03-0005-12

[DOI] 10.13529/j.cnki.enterprise.economy.2026.03.0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4&ZD039)

[作者简介] 黄群慧,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与国有企业;(北京 100836)

盛方富(通讯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与区域经济。(北京 102488)

Abstract: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proposed to "build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with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s the backbone". Why is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he backbone of the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This paper aims to seek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is purpose. Based on Marx's description of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large-scale machine industry as "engine - transmission mechanism - working (tool) machine",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classification model of industrial systems, that is, the industrial system is composed of "energy, resources and power industrial system - transportation, communication and connection industrial system - manufacturing, processing and production industrial system". Among them,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ing and production industrial system is the core component of the industrial system.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uring the modernization evolution of the industrial system, these three types of industrial systems have undergone revolutionary changes along with breakthroughs in general technologies and the replacement of old industrial sectors by new ones. In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s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corresponding to and serv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t carries can also be explained through an industrial system classification model, that is, to form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with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haracterized by intelligence, greenness and integration as the backbone, and consolidate the core subject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o form a modern energy, resource and power industry system with new energy as the main body, and consolidate the green power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o form a modern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onnection industrial system with high-speed information networks, efficient computing power networks, etc. as the main body, and enhance the new basic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o prevent the industrial system from falling into a "structural trap", based on the industrial system classification model,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coordinated progress in aspects such as the energy, resource and power industrial system, the transportation, communication and connection industrial system,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ing and production industrial system, as well as the reform and improvement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with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s the backbon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Keywords: industrial system; advanced manufacturing;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的首个重大任务,提出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凸显了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进程中赢得战略主动的特殊地位。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先进制造业何以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骨干”?这是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最新表述要求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本文拟基于马克思关于机器大工业的论述,尝试构建产业体系新分类模型,并据此考察产业体系的现代化演化发展,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构成、主要特质,为先进制造业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骨干提供学理支撑和历史考察。

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构建创新能力强、品质服务优、协作紧密、环境友好的现代产业新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等。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首要组成部分,到2035年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系我们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同时,会议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内涵、特征和要求进行了深刻概括、总结,并指出:“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通过梳理现代化产业体系政策表述的演变,可以看出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认知呈现如下特点:一是更加突出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地位作用,提出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从实体经济的内涵看,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部分,可以理解为最狭义的实体经济;制造业、农业、建筑业和除制造业以外的其他工业,是经济体的主体部分,是一般意义或者传统意义上的实体经济;而关于实体经济最为广泛意义的理解是除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外的所有产业(黄群慧,2017^[1])。因此,既然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就是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段时间以来,受西方产业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产业体系高度化演进方向是以服务业为主导,然而经历了“去工业化”之殇的美国在近年来大力提倡“再工业化”以期重振国内制造业,表明制造业始终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石和国家竞争力的命脉所在(贾根良和楚珊珊,2019^[2])。故自2017年以来的政策表述中突出强调实体经济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更加突出强调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产业体系肯定不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对应并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其发展所需的关键共性技术、现代工程技术等应实现独立自主,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等应实现安全可靠获取,以确保在极端情况下重点产业链供应链能安全运行,这也是应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现实需要和战略选择。三是更加突出智能化与绿色化协同融合一体发展,指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转型升级方向。为实现“3060”目标,“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实现碳达峰,而降碳的主要领域在产业领域,特别是制造业领域。近年来,我国强调以绿色化贯穿智能化全过程、以智能化赋能绿色化全流程,探索建设智能化与绿色化协同融合一体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四是更加突出质量导向。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内在要求发展具有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新质生产力,作为承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必然突出发展的质量导向,强化科技创新的核心引领作用。

在对现代化产业体系认识的基础上,学界也对产业体系内涵、构成及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一是关于产业体系的内涵。已有研究主要基于系统论和结构论视角予以理解,芮明杰(2018)^[3]认为,产业体系就是所有产业相互关联衔接的系统,它既是全社会所有产品投入产出相互关联的体系,也是所有产品供给、流通与消费的一体化体系,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也有学者从结构论的视角看待产业体系,认为“产业体系”是“产业结构”的概念延伸和内涵深化(夏杰长和李奎溟,2023^[4]),贺俊和吕铁(2015)^[5]提出,对现代产业体系概念的界定,既要能够准确承接传统产业研究中的合理成分,也要充分认识到既有的产业结构研究与已经发生了深刻转变的经济现实之间存在的日益严重的冲突,从而在推进理论创新的同时,为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更有力的分析工具。二是关于产业体系的构成。产业体系即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结构比例关系,以及各次产业内部的结构比例关系(高培勇等,2019^[6])。洪银兴(2024)^[7]认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指的是未来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依次递进的体系。也有学者认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包含产业结构体系、特征体系和支撑体系,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推动着产业体系的现代化演进过程(陈英武等,2023^[8])。三是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特征。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特征包括数智化、绿色化、融合化“三化”,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三性”,以及“+文化”(李海舰等,2024^[9])。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既要遵循现代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形成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协调性、安全性、开放性、包容性的产业体系(黄群慧,2024^[10])。

通过文献梳理不难发现,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具有中国语境并处于动态演进中的概念,根据不同的划分,其构成类型各异,如基于统计意义的一产、二产和三产,基于技术成熟度的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已有关于产业体系的研究,难以为“先进制造业何以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骨干”提供直接的、合理的学理支撑,进而也就难以有效阐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最新理论命题。本文拟就此展开研究,边际贡献集中体现为:一是基于马克思用“发动机——传动机构——工作(工具)机”描述机器大工业工作原理,尝试构建“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的产业体系新分类模型,这是区别于已有产业体系分类的新的产业体系分类方式,也是本文的

主要创新点之一；二是基于“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的产业体系分类模型，研究分析产业体系承载发展社会生产力变迁的内在机理与演进过程，能够较好地理论上阐释“先进制造业何以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骨干”，这是本文的另一主要创新点；三是基于构建的产业体系分类模型，本文分别从能源资源动力类、交通通讯连接类、制造加工生产类三类产业体系以及改革完善生产关系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助推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二、一个基于马克思机器大工业论述的产业体系分类模型

马克思关于机器大工业工作原理的相关论述，为本文构建产业体系分类模型提供了理论支撑。

（一）产业体系分类模型

马克思用“发动机——传动机构——工作（工具）机”描述了机器大工业工作原理，指出工业革命背景下生产力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是机器（物化劳动）替代劳动（活劳动），从而揭示了工业革命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根本原因。马克思认为：“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发动机是整个机构的动力……传动机构……把运动分配并传送到工具机上……由此工具机才抓住劳动对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变它。”^[11]迄今为止马克思关于机器大工业的基本界定依然成立，现代工业的物质载体依然是一个以机器体系为中心的物质生产系统，而信息化和智能化只是提升了人类操作这一系统的效率和便利性（刘刚，2023^[12]）。如果把“发动机——传动机构——工作（工具）机”理解为一个抽象的模式或者模型，并将这个模型拓展到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部门，就大致对应了工业化的产业体系，这个产业体系主要体现为“能源产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而这大体支撑了一个国家的总体的产业体系（黄群慧，2024^[10]）。

根据产业体系的系统共生特征，借用马克思“发动机——传动机构——工作（工具）机”的机器大工业工作原理，根据已有研究观点，借鉴“动力——传动——加工”的基础逻辑，进一步拓展到更广泛意义的产业类型上，本文尝试提出“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的产业体系分类模型（见图1）。这种分类有助于研究分析产业体系承载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内在机理与演进过程，特别是有利于理解不同产业在整个产业体系之间的关系、地位和作用。基于该产业分类模型，产业体系由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三类子体系构成，这三类子体系都是一个广义的内涵，其中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主要是指能源产业，但广义上还包括农业、矿业等可以视为资源的产业，为人类自身提供能量以及为产业发展提供动力；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主要包括交通运输、各类信息通信，更为广义的含义是促进实体物品流通、知识信息传递和资金融通的产业，这意味着金融服务业也可以认为是这类“连接类”产业；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主要是一般意义上的制造业，也包括一些生产性服务业，如科研可以认为是知识生产产业。这三个子体系之间紧密相关、相互作用，构成了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产业体系。其中，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为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运行提供能量和动力支撑，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为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提供其运行所需实体、信息和资金等传输渠道，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则为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提供物质技术支持、创造价值增值实现和生产效率改善。三者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共同驱动产业体系现代化演进及其承载的生产力水平提升。

（二）产业体系中不同构成的功能作用

根据图1可知，产业体系中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处于骨干中枢地位，不同发展阶段的制造加工生产是丰富物质技术、创造社会财富和推动创新发展等的重要来源，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承载产业和主要体现。强调制造业在产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遵循了马克思的基本逻辑。马克思认为，劳动资料中纺织机械这种工具机的革命而非蒸汽机的动力革命，才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起点和诞生的标志，何况蒸汽机本身也是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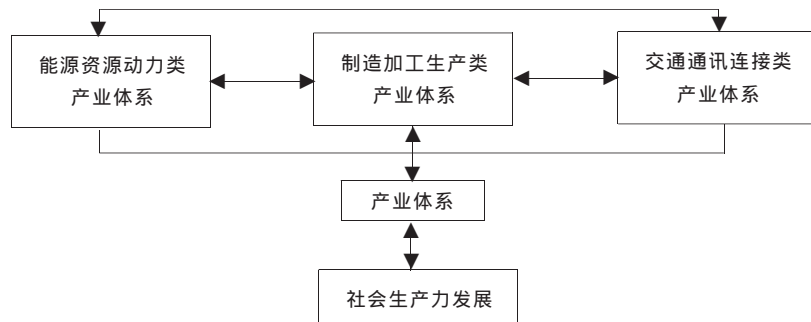


图 1 产业体系分类模型示意图

制造业发展的成果,纺织机械的发明是机器大工业与工场手工业相区别的根本性标志(黄群慧,2024^[10])。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既对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提出强劲需求,也为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的迭代升级提供技术制造支撑;与此同时,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的循环运转需要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的服务保障,既对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提出服务需求,又为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的升级提供技术制造支撑,并最终通过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连接供给与需求、生产与再生产等环节,进而实现加工制造生产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

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是产业体系的动力或者说能量保障。能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体现。产业体系中无论是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还是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以及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本身,都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保障,能源资源动力供给类型、供给方式以及供给结构等的变化,往往会体现为运输方式、通讯方式、连接方式等的同步变迁,而这些变化既与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的发展阶段有关,又会综合作用于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的升级发展,进而推动社会产业体系的不断演进。

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是产业体系的循环运转支撑。连接技术和连接方式在历次工业革命都扮演了关键角色,工业革命的发展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连接”的推进过程,没有人与人、人与物以及物与物之间连接的进步所带来的贸易繁荣和文明交流,人类社会也不可能取得长足的进步(胡乐明等,2019^[13])。能源资源动力的运输,以及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的价值实现等,均有赖于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的支撑。一种新技术类型最初显示出明显的优势和巨大(国际性)潜力,但它取得支配地位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扩散必需的新基础设施^[14],工业革命史告诉我们,与前两次工业革命中资本替代体力劳动的工业化相适应,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革命占主导地位,在以人工智能系统替代脑力劳动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信息通讯基础设施革命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以往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革命的作用(贾根良,2016^[15])。

(三) 产业体系中各子系统之间是有机联系的整体

马克思指出:“一旦工厂制度达到一定的广度和一定的成熟程度,特别是一旦它自己的技术基础即机器本身也用机器来生产,一旦煤和铁的采掘、金属加工以及交通运输业都发生革命,总之,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的跳跃式的扩展的能力。”^[16]因此,一国或区域产业体系承载发展生产力,在制造业的发展支撑下,需要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等子系统的配套支撑与交互作用。正是凭借着煤——铁——蒸汽机的协同,英国成为工业革命的弄潮儿;正是凭借规模惊人的铁路、钢铁、集中分布式电力和重型机器之间的大协同,美国才在 19 世纪末期成为第一工业大国(杨虎涛,2020^[17])。并且,在开放的竞争格局中,如何以制造加工技术为突破口,统筹协同好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之间的共生关系,是世界格局下产业体系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课题,也是增强产业体系竞争力必须直面的发展命题。一方面,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为整个产业体系提供了转型升级所需物质技术的核心支撑,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和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本身的创新发展,依赖于制造业提供的生产加工技术;另一方

面,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与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的升级发展,有助于促进资源要素的流动速度和优化配置的广度、深度等,通过提高资源要素的使用效率和创新配置效率,拓展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的可能性边界,从而在进一步的分工与协作中扩大市场量能甚至创造新的市场,市场总需求规模的扩大、结构的多元、场景的丰富等,将反过来拉动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向着更好满足市场需求的方向升级演进,进而通过产业体系中各个子产业体系的良性循环推动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三、产业体系演化的现代化进程分析

根据构建的分类模型,产业体系是由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等相互关联构成的具有结构演进特征的有机系统,各构成体系在整体产业体系中相互作用并共生动态演进,承载社会生产力量变积累和质变跃迁。

(一)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动态演进与产业体系发展

从某种程度上看,人类社会史其实是一部能源利用史。能源问题是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人们为了争夺能源而打个你死我活,企业因此繁荣或衰败,国家因是否能获得能源而上升为世界强国或地位下降——凡此种种,皆依赖能源。^[18]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能源是文明发展的基础,但在把能源转换成历史发展的动力过程中,人类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都施加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发展的能源基础主要是光合作用,被动式的能源获取方式和条件也就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业革命之后,伴随发展需要和技术水平提升等,人类积极发掘地球上各式各样的能源,凝固的太阳能(煤炭)、液态的太阳能(石油)、间接利用煤炭的电力,甚至最新科技的核能等,主动破解能源制约的方式与条件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表1梳理了工业革命以来能源供给的大致演变历程,从传统的水力、蒸汽动力到机械动力、石化动力乃至新能源等,能源成本与动力续航里程等的变化,影响到产业、技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制度、消费习惯等的变迁,进而最终在需求的收入弹性即社会需求结构与生产率提升率即技术进步等的综合作用下,产业体系中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处于长期的动态演进之中,并且在这个演进的过程中,保障产业体系演进的能源供给来源日趋多元化,包括传统能源和新型能源并将长期共存,进而有助于产业体系共生系统的有序演化与交互融合发展,并一体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二)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动态演进与产业体系发展

产业作为生产一群同类产品的一群生产单位的集合,本质上是资源要素有机组合的产物,资源要素有机结合的前提是能够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这就需要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有力支撑,故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是产业发展的延伸。马克思认为:“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就越是重要。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19]产业发展所需的资源要素的流向、流速、流量以及流动的半径等与交通通讯系统等基础设施体系的支撑能力密不可分,这直接关系到生产力中生产要素组合的可能性集合及其组合效能。表1的梳理显示,工业革命以来的运河、铁路、汽车、飞机、互联网、通讯网、算力网等的演进历程表明,交通通讯系统等基础设施是服务和支撑各个阶段产业及产业体系发展的重要一环,从某种视角来看,交通通讯系统等基础设施体系现代化水平的高低,成为衡量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高低乃至衡量社会生产力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完善的交通通讯等现代基础设施,既是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动力,也是现代化实现的重要标志(黄群慧,2020^[20])。如果说在以前的工业革命中主要是铁路、公路、机场、电网、远程通讯等交通通讯基础设施,那么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更需要互联网、算力网、通信网、大数据等信息基础设施(黄群慧,2024^[10])。

(三)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动态演进与产业体系发展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生产力实现极大提升,正如马克思强调指出的:“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

表 1 18 世纪以来产业体系分类模型发展演进

工业革命	技术革命	产业体系		
		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	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	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
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始于 1771 年,英国	水力(经过重大改良的水力涡轮)	运河和水道 收费公路	机械化的棉纺织业、机器制造业等
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始于 1829 年,英国,扩散到欧洲大陆和美国	水力+蒸汽动力等	铁路;普遍的邮政服务;电报(主要在一国铁路沿线传输);大型港口、仓库和航行世界的轮船	铁矿业、煤矿业、纺织业、机器制造业等
	第三次:始于 1875 年,美国和德国超过英国	蒸汽动力+电力等	钢制高速蒸汽轮船在世界范围内的航运(通过苏伊士运河);世界范围的铁路(使用标准尺寸的廉价钢轨和枕木);大型桥梁与隧道;世界范围的电报;电话(限于一国范围内);电力网络(用于照明和工业)	重化工业、电力设备工业、罐装和瓶装食品工业、纸业和包装业等
	第四次:始于 1908 年,美国,后扩散到欧洲	电力、石化能源等	公路、高速公路、港口和机场组织的交通网络;石油管道网络;普遍的电力供应(工用和家用);世界范围内的有线或无线模拟远程通讯(电话、电报和海底电报)	汽车产业、石化产业、家用电器产业等
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五次:始于 1971 年,美国,扩散到欧洲和亚洲	电力、石化能源等	世界数字远程通讯(电缆、光纤、无线电和卫星);因特网/电子邮件和其他 E 化服务;(水陆空)高速物流运输系统	信息产业、电子产业等
	第六次:始于 2008 年,美国、日本、欧洲和中国	电力、石化能源、新能源等	新一代无线网络(5G、Wi-Fi)、物联网和云计算(云网络、智能电网等)	大数据产业、新能源产业等

资料来源:第一次至第五次技术革命内容根据“卡萝塔·佩雷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田方萌、胡叶青、刘然、王黎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19页)”整理,第六次技术革命内容根据“贾根良,2016:《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工业智能化》,《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整理,新一轮产业变革内容为作者补充。

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21]故而工业化成为世界各国推动迈向现代化的重要阶梯,分析发达国家群体构成及其各自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基本上是通过走工业化道路实现的。“工业化”是指国民经济中一系列重要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的过程(张培刚,2009^[22]),集聚和承载生产要素组合的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则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重要体现。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禀赋条件,往往形成具有差异化的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与此同时,不同的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又体现为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发展进程的快慢,特别是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的升级转换能力往往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综合竞争力的核心关键。根据表 1 可知,伴随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演进,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经历了棉纺织产业、铁器制造业、钢制品制造业、重化工业、汽车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等制造业主体的变迁,由此顺次经历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等的跃迁。当然,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并非消失不见,有的(如纺织业)同新技术、新产业的有机融合实现新发展,向着生产率不断提升的方向演进,进而一体促进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在当前数智时代,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发生巨大变革,但社会生产力真正的驱动力量还是来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主导产业系统,只是呈现出制造业信息化和服务化的趋势(黄群慧,2017^[23]),人工智能产业、绿色低碳产业、生命健康产业等正日益成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主体。

(四)产业体系演化是其构成体系协同共生演进的动态过程

根据产业体系分类模型,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

系之间的动态演进具有鲜明的协同共进特征,单个系统的进步不可避免会对另外两个系统的发展提出需求或挑战,在需求或挑战的作用下会形成链式反应与反馈式响应机制,一般而言,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引发产业体系矛盾运动的主要动力来源。正如大卫·兰德斯(2007)^[24]的观点,各种发明创造在互为挑战、互为响应的次第中接踵而来,制造生产进程中某一阶段的加速将导致其他一个或多个阶段中生产要素的严重紧张,从而催生出新的发展来扭转这种不平衡的状态,这种“从挑战到响应”的发展模式是英国工业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每次技术革命都使得整个制造生产体系得以现代化和更新,而技术革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一组技术创新集群,一般包括一种重要的、通用的低成本投入品——这种投入品往往是一种能源,有时则是一种重要的原材料——再加上重要的新产品、新工艺和新的基础设施。^[25]因此,推进产业体系向更具质态的方向演进,需要以系统思维统筹推进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的协同共生发展。

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特质

所谓先进制造业,主要是以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为主体内容的制造业,突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正是由于在三大子产业体系中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具有核心地位和促进产业体系效率提高的决定意义,故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主要特质代表了产业体系的现代化特质,集中体现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

(一)智能化: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特征

智能化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特征。回顾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历程,产业体系大致经历以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为核心特征的演进阶段。近年来,以 ChatGPT、Deepseek 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持续涌现,加速了人类社会的智能化进程,人类文明正在深刻演化。有学者认为,在以大模型为基底技术的智能生产力中,技术的生产力化就体现为大模型的生产力化,抑或说智能生产力就具体体现为大模型所蕴含的生产力,将产生引领技术与社会发展的整体效应,可能缔造出一种新型的文明——智能文明(肖峰,2024^[26])。在这一进程中,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骨干的先进制造业,智能化程度是衡量其先进水平的关键标尺。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到 2030 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1 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 10 万亿元。智能制造发展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改造升级,即随着“人工智能+”行动的全面实施,传统制造业通过积极运用先进数智技术进行智能化改造升级,在传统产业全要素智能化发展中推进传统制造业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夯实智能制造的主体根底;另一方面则是人工智能核心产业的快速发展,即伴随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持续迭代升级和广泛深度运用,基于智能原生技术、产品和服务体系等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将加速发展,广阔的场景应用创新将驱动壮大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加速提升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在制造业中的份额,并牵引加速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信连接类产业体系的智能化发展。

(二)绿色化: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鲜明底色和内在要求

绿色化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鲜明底色和内在要求。稳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是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路径,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是碳排放的主要领域,其中又以制造业为重点。研究表明,我国工业碳排放约占碳总排放量的 68%,如此之高的占比在全球所有主要国家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丁仲礼,2022^[27])。与此同时,伴随人工智能时代的加速到来,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深入推进,然而,人工智能本身也是重要的碳排放源(Dhar,2020^[28]),如何降低能耗、突破“能耗墙”是世界级难题(孙凝晖,2023^[29])。因此,推动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的绿色低碳发展关系到能否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全局。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以加快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稳妥推进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推进交通运输绿色转型等为重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大力发展绿色制造,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绿色化水平,一方面,需加大研发绿色化、低碳化先进技术并强化推广运用,推动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的绿色化、低碳化发展;另一方面,积极抢抓推进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发展机遇,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孕育的巨大市场需求中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以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动能。

(三)融合化: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形态特征

融合化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形态特征。信息通讯技术革命的兴起,生产和流通形成了物理连接和基于数字技术信息连接的双重连接,也改变了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特征,人工智能、5G等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使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产业特征上更加趋同,在产业功能上趋于融合(胡乐明和杨虎涛,2022^[30])。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超越了传统时空场域维度,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地深海深空等现代技术以及各类新型基础设施,在天、地、空、网等立体链接的开放场域中快速拓展延伸、融合跃迁(黄群慧和盛方富,2024^[31]),特别是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一二三产业、服务业和制造业、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等融合发展广度、深度日益拓展。根据产业发展的演进历程来看,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一般遵循农业主导、工业主导和服务业主导的高级化规律,在工业化后期一般都是服务业占主导地位(黄群慧,2024^[10]),然而对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认识需辩证看待,应主要体现为以服务型制造为主要内容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并以此促进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即不断攀越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领域。当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在于突出创新的主导作用,基本路径在于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而这一过程涉及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场景应用创新牵引、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等一系列服务型制造过程。因此,“十五五”时期,以融合化为方向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就是要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等发展服务型制造,以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融合化水平,进而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需要看到,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特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是相互促进、紧密关联的有机体,推进智能化有助于提升绿色化水平、加速融合化进程,推进绿色化则标定了智能化的底色要求、明确了融合化的重点取向,促进融合化则丰富了智能化的应用领域、拓展了绿色化的路径空间,三者交互作用中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

五、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作为承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必然要求其构成的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实现现代化,即以现代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现代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现代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

(一)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主体支撑

制造业是科技创新应用最集中、科技创新活动最活跃、科技创新成果最丰富、科技创新溢出效应最强的产业(黄群慧,2023^[32]),作为生产力要素载体的产业体系,制造业发展无疑对生产力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创新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关键就是要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主攻方向,夯实先进制造业的骨干支撑。围绕制造业“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短板弱项,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和制造业基础能力;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滚动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促进制造业数智化转型,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探索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传统产业优化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筑牢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进而承载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

(二)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现代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绿色动力基石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作为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发展新能源和推动传统能源的绿色化发展至关重要。我国当前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大数在100亿吨左右,这主要由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消费结构所决定的,每年50亿吨左右标准煤的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者合起来占比接近85%,而碳排放因子最高的煤炭又占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者之和的近70%,因此应加快推动电力/热力供应端的以煤为主改造发展为以风、光、水、核、地热等可再生能源和非碳能源为主(丁仲礼,2022^[27])。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能源供给结构转型,新能源发展加速。根据中国电力联合会发布的《2024年上半年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截至2024年6月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30.7亿千瓦,其中煤电占总发电装机容量的38.1%,并网风电和并网太阳能发电合计占总装机容量的38.4%,表明新能源装机规模首次超过煤电,这是我国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电力结构绿色低碳转型的一个“里程碑”,这将为全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提供坚实的绿色能源保障,有力夯实绿色生产力发展的绿色能源基石。

(三)以高速信息网、高效算力网等为主体的现代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增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基础支撑

纵观世界文明史,人类先后经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每一轮革命都在科技创新引领下孕育出新的基础设施,并推动产业变革向纵深发展,进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刘烈宏,2024^[33])。当今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如同铁路、公路、机场、码头、水利、能源、城市公共服务等各类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和人类现代化生活至关重要一样,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物联网、清洁能源网络、智慧城市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发展和信息时代人类现代化生活实现具有决定性意义(黄群慧,2020^[20])。在大数据、大算法、大算力的大模型发展趋势中,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现代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支撑的高速信息网、高效算力网等现代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以及相应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对承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循环运转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四)现代化产业体系承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动态能力需求

现代化产业体系承载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一定的外力作用,特别是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当产业体系中传统产业主导但增长不断下滑,新兴产业虽然在成长但因缺乏核心技术、缺乏人才、发展阻力巨大等而发展缓慢,则可认为产业体系陷入“结构性陷阱”(芮明杰,2018^[3])。走出产业体系“结构性陷阱”的唯一出路就是推进基于科技创新的产业创新,而这种创新需要产业体系中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的协同式集群式创新。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同样需要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各个子系统的创新协同演进,这种巨系统的结构性协同对制度或国家动态能力提出较高要求,因为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基于特定制度基础而被“组织”起来的要素累积过程(贺俊和吕铁,2015^[5]),制度的差异也即背后国家动态能力的差异是关系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及其承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抢抓新生产力系统与传统生产力系统演进转换的战略机遇,需要来自宏观、中观、微观等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所蕴含的综合动态能力的有机作用(黄群慧和盛方富,2025^[34])。因此,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方向,改革完善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朝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最有利方向系统性改革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并强化相互之间的有机协同,促进社会——制度领域动态适配技术——经济范式变革,是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战略机遇的基本路径。

六、政策建议

基于产业体系分类模型,为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一)大力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形成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用足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等,在人工智能、绿色低碳、服务型制造等领域强化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等创新,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等,培育一批灯塔企业、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将人工智能产业、绿色低碳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等培育成为具有世界引领力竞争力的先进产业集群,真正将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强物质技术支撑。

(二)加快形成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现代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绿色化水平

以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为牵引,推进能源强国建设,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扩大绿电应用,稳步提升新能源在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具体而言主要从能源动力供给端和消费端着力,能源动力供给端方面,通过发电技术、储能技术和输电技术的持续突破与革新,推动可再生能源和非碳能源成为我国能源供给的主要来源和可靠来源;能源动力消费端方面,在建筑、交通运输、工业生产等领域有序用绿电、绿氢、地热等非碳能源替代传统的煤、油、气,并在替代过程中强化相应工艺技术的创新,以尽可能降低能源消费成本。

(三)加快形成以高速信息网、高效算力网等为主体的现代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数智化水平

面向未来通信、未来出行、未来算力等发展与需求,服务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需要,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生命健康、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领域,适度超前布局发展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形成全国一体的新能源网、大数据网、算力网、天地空立体网等,以构建现代化综合立体的现代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发展。

(四)完善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体制机制基础

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300多项改革任务为统领,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体制机制、持续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促进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强化科技金融产业循环发展的体制机制等,促进形成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升级发展的制度体系和政策举措,以系统思维促进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之间创新发展的整体部署和有机协同,并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不断优化相应的改革举措和体制机制,以推动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最大协同效应和整体效益,抢抓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机遇之窗”。

参考文献:

- [1]黄群慧.论新时期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J].中国工业经济,2017,(9):1-19.
- [2]贾根良,楚珊珊.制造业对创新的重要性:美国再工业化的新解读[J].江西社会科学,2019,(6):41-50.
- [3]芮明杰.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思路、目标与路径[J].中国工业经济,2018,(9):24-40.
- [4]夏杰长,李奎湲.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现实基础、约束条件和关键突破[J].河北学刊,2023,(6):113-122.
- [5]贺俊,吕铁.从产业结构到现代产业体系:继承、批判与拓展[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2):39-47.
- [6]高培勇,杜创,刘霞辉,等.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一个逻辑框架[J].经济研究,2019,(4):4-17.
- [7]洪银兴.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J].当代经济研究,2024,(2):7-9.
- [8]陈英武,孙文杰,张睿.“结构—特征—支撑”:一个分析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新框架[J].经济学家,2023,(4):44-55.
- [9]李海舰,李真真,李凌霄.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理论内涵、问题与对策[J].经济与管理,2024,(4):42-49.
- [10]黄群慧.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工业化[J].中国社会科学,2024,(6):19-26.
- [11][德]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先进制造业何以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骨干?

- [12]刘刚.工业发展阶段与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11):111-125.
- [13]胡乐明,刘刚,高桂爱.经济长波的历史界分与解析框架:唯物史观视角下的新拓展[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5):89-103.
- [14][英]克利斯·弗里曼,[英]弗朗西斯科·卢桑,著.沈宏亮,等译.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15]贾根良.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工业智能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6,(6):87-106.
- [16][德]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7]杨虎涛.数字经济的增长效能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3):21-32.
- [18][美]理查德·罗兹,著.刘海翔,甘露,译.能源传:一部人类生存危机史[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20.
- [19][德]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20]黄群慧.以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0,(11):28-31.
- [21][德]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2]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 [23]黄群慧.全面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新阶段[N].经济日报,2017-05-18.
- [24][英]大卫·兰德斯,著.谢怀筑,译.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1750年迄今西欧的技术变革和工业发展(第二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 [25][英]卡萝塔·佩蕾丝,著.田方萌,胡叶青,刘然,等,译.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26]肖峰.大模型与智能社会: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探察[J].中国社会科学,2024,(7):71-89.
- [27]丁仲礼.深入理解碳中和的基本逻辑和技术需求[J].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2022,(4):23-40.
- [28]Dhar P.. The Carbon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J].Nature Machine Intelligence,2020,2(8):423-425.
- [29]孙凝晖.从算盘到量子计算:计算机是如何越来越快的?[J].科学新闻,2023,(5):16-19.
- [30]胡乐明,杨虎涛.产业发展战略选择的内在逻辑:一个连接演进的解析框架[J].经济研究,2022,(6):45-63.
- [31]黄群慧,盛方富.新质生产力系统: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J].改革,2024,(2):15-24.
- [32]黄群慧.以新型工业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J].智慧中国,2023,(5):28-31.
- [33]刘烈宏.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推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数字基座[J].中国信息化,2024,(4):5-8.
- [34]黄群慧,盛方富.论新质生产力系统的要素组合与演进阶段[J].企业经济,2025,(7):5-14.

[责任编辑:李小玉]

黄群慧,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公共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十四五”“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第八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万人计划”国家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制造业发展、企业改革与管理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4项及其他国家级研究项目多项,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学术刊物公开发表论文三百余篇,撰写《读懂新质生产力》《工业化后期的中国工业经济》《企业家激励约束与国有企业改革》《新时期全面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研究》《新工业革命:理论逻辑与战略视野》等专著30余部,被翻译为英文、西班牙文、日文、德文、韩文等多种文字。其成果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奖、“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等多项荣誉,作品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优秀通俗理论读物出版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等。

